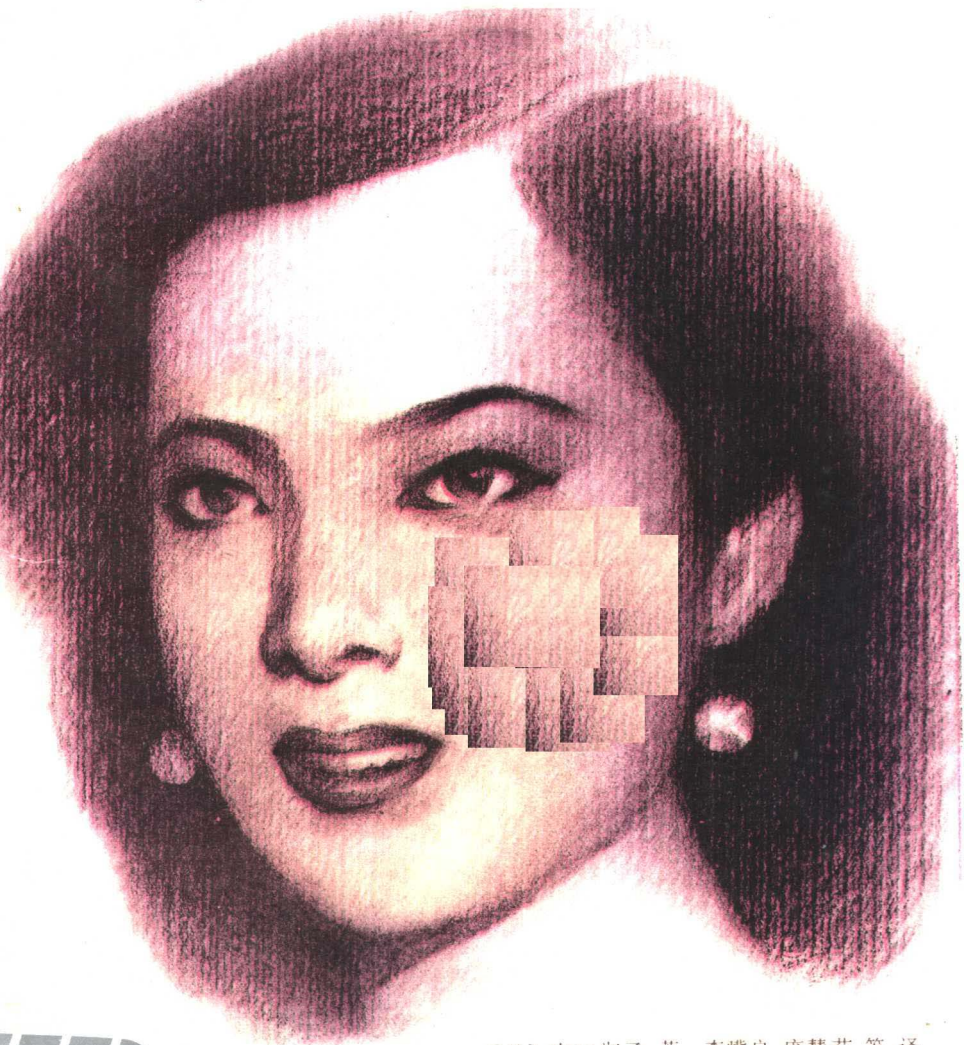


我的半生



〔日〕山口淑子 著 李骥良 庞慧茹 等译

我的半生

〔日〕山口淑子 著
李骥良 庞慧茹 等 译

Wo De Ban sheng

我的半生

李骥良 庞慧敏 等译

责任编辑：吴 燕

封面设计：王 潇

吉林文史出版社出版 787×1092毫米32开本11.25印张4插页251千字
(长春市斯大林大街副136号) 1990年4月第1版 1990年4月第1次印刷
农安县印刷厂印刷 印数：1—6 160册 定价：4.30元
吉林省新华书店发行 ISBN 7-80528-229-3/I·37

译者的话

提起李香兰这个名字，中国广大的读者并不陌生。特别是年岁大一些的读者，至今还不会忘记李香兰的歌声曾回荡整个沦陷区，甚至越过了沦陷区飞到当时的大后方；李香兰美丽的容貌曾以多种形象出现在电影银幕上，日本投降时，她又曾以“汉奸罪”被拘留并险些被送上刑场……

李香兰给中国人留下的印象既深刻又是捉摸不定的。她不仅是红极一时的歌星和电影明星，其经历也极富有戏剧性和传奇色彩。至今很多读者还不知道李香兰究竟何许人也，到底是日本人还是中国人，日本投降以后她的命运怎样，她现在如何……

山口淑子女士的这部自传，对上述问题作了详尽而明确的回答。“李香兰”是她当年的艺名，本名叫山口淑子，是生于中国东北的日本人，现名叫大鹰淑子，日本国会议员。她曾多次来中国访问，旧地重游。尽管大鹰女士战前曾以李香兰的艺名为日本在文化战线上推行大陆政策而效过力，但不能将她同那些日本帝国主义分子相提并论。她反对战争，主张中日友好。战后，她不仅对她的过去一再表示“告别”，而且热心于中日友好交流事业。

这部自传实际上记录了大鹰女士整个艺术生涯；而她作为李香兰那段经历，又与中日关系史上最不愉快时期紧紧地联系在一起。她的命运随着历史的动乱而起伏。该书对中国广大读者，对热心于研究中日关系史的学者，对有兴趣了解当年日本占领区文化的青年同志，将会有一定参考价值。

不言而喻，由于处境不同，中国读者对书中某些观点不一定会完全赞同，比如对某些中日历史人物的评价，对某些影片及历史事件的看法，总会不同程度地存在着差别。我们的出发点是开卷有益，求同存异。

本书由李骥良、庞慧茹、郭洪茂、杨寒、尹承俊同志译出，由高书全同志译校并统稿全书。为保持书中原有风格，译文中依然保留了一些当时用的专有名词，特此声明。由于水平有限，错误难免，请读者批评指正。

1989年8月1日

第一章

抚顺时代

我对中国大陆的追思，将从抚顺开始。

以露天采掘闻名的抚顺，是满洲铁道株式会社（简称“满铁”）经营的煤矿城市。至今浮现在我眼前的仍然是那幅令人难忘的画面：那直到谷底都镂刻着螺旋形花纹的青色悬崖峭壁，映衬着沥青色的煤层，一列列货车，长鸣的汽笛，远处云蒸霞蔚的工厂烟雾，以及深山峡谷的落日余晖……

我于1920年2月12日生在中国东北，现在的辽宁省省会沈阳（旧奉天）近郊的北烟台。出生后不久，我家迁居到抚顺。因此，抚顺几乎占据了我少女时代全部瑰丽的回忆。

那坠落在一望无际的高粱地里的满洲落日，是十分有名的。然而，抚顺的夕阳和露天煤矿宏伟的景色交相辉映，更是壮观。夕阳把煤矿路旁盛开的马蓼花映照得更加红艳。

我家住在抚顺市东六条马路，这是抚顺市的中心。露天矿开采区位于市南郊。我们这些小学生，只是郊游或是学校组织参观活动时，才能有机会去采区。

平素，我和俊子、美都里等小朋友来往于市中心和南大街的永安小学校之间，这就算是我们每天的全部事情了。

东七条马路一直向东走，从东第三条街的拐角，到穿过抚顺神社的棋盘格子式的大街，路的两旁都栽着白杨树。然而，现在的抚顺，烟囱林立的煤城风光，晴空下郁郁苍苍的林荫道，更显得一派生机。

今天的抚顺市街反映出了促进资源开发的国策，生产繁忙。而过去的抚顺是在抗日武装的袭击下战战兢兢生活的煤矿城镇。但是，无论怎么说，我当时还是一个不懂事的少女。对我这个少女来说，抚顺有挺拔的白杨树和露天采掘峡谷的辽远的景致，是座非常和谐、宁静的丘陵城镇。那里有我亲密的伙伴，慈祥的父母，可爱的弟弟、妹妹……

这种和平的景象一直持续到满洲事变爆发。

我在抚顺市长到12岁。18岁那年的秋天，我进行了一次短期旅行，第一次到了东京。我全然不知道日本是我的祖国，可以说，我是在“满洲土生土长”的。

在日本人的日常社会生活中，我用日语说话，后来却起了个中国人的艺名——“李香兰”，并且说汉语，是个用汉语演唱的女演员。这样，我成了一个国籍不明的人。

战前，我是个为社会形势所左右而且什么都不懂的姑

娘。觉得活着就应把日本和中国这两个国家，一个当作祖国热爱，一个当作故乡热爱。可事实上，当时这两个国家正在对峙，正在战斗。

然而，真正深刻地体验到双重国籍的悲苦，那还是很多年以后的事情。抚顺时代，我还只是个什么都不明白平平常常的女孩子。

我是父母的第一个孩子。父亲叫山口文雄，1889年生在佐贺县。父亲的父亲，也就是我的祖父叫博，是士族出身的汉学者。父亲受祖父的薰陶学习汉语。日俄战争结束的第二年，即1906年，父亲到了憧憬的大陆中国。

父亲先在北京读书，后经熟人介绍，在满铁找到了工作，从烟台采矿所又转到抚顺煤矿。因为擅长汉语，通晓中国的风俗习惯，在满铁，父亲一方面教其他社员学习汉语和中国风情，另一方面好象还做抚顺县顾问之类的工作。

我能说一口标准的中国话——北京官话，其基础教育，都是来自我的父亲。父亲和当时其他一部分到中国的日本青年们一样，都是有一定志向的青年，在汉语学习上，也是倍加用心。因此，父亲的中国朋友和熟人也非常多。入满铁前，父亲曾在北京的中国语专门学校“同学会”学过，那个时候就结识了李际春、潘毓桂等战前亲日派的中国人。他们两个人都是财界和政界的头面人物。按中国的习惯，这两位与父亲结拜成把兄弟，依同样的风俗，我在礼仪上便成了养女。因此，我也起了“李香兰”、“潘淑华”等中国名字。

母亲出生于九州福岡县。外祖父叫石桥近次郎，是驳船批发商。由于铁路的发达，难以维持营业，一家迁渡到朝鲜的京城（现在的汉城）。后来，又投奔在抚顺经营碾米厂的叔

叔，迁居到中国。

父亲山口文雄与比他小五岁的石桥爱是在抚顺相识、结婚的。究竟是恋爱结婚还是相看结婚，明治时代的人是不讲这些的，所以也无从知晓。

父亲在日本就娴熟中国古籍和汉语，又在北京的同学会学习过，从日本的学制来说，可谓自学成材。与此相反，母亲却是毕业于东京的日本女子大学，是名符其实的知识女性。

母亲对我们采取的教育很严格，特别是在待人接物的礼仪方面尤其如此。我的算术不怎么好，母亲经常让我到住宿在东本愿寺（抚顺别院）的学生们那里去学。可是母亲还有孩子气的一面。当我们这些孩子在院子里玩泥巴的时候，她不仅不申斥我们，还一起入伙，跑得浑身是泥，玩得十分开心。

我喜欢语文和音乐，讨厌算术和体操，最擅长的是音乐。尽管父母对我这个长女寄予了很重但又很难说清楚的期待，为教育我倾注了极大的热忱，可他们并没有让我一定象日本内地女孩子那样，去学习茶道、花道、烹饪、裁缝等等。

取而代之的是，让我学习小提琴、钢琴、古琴等。每当我放学，还让我们三个好朋友一起玩玩，每两天去学习一次音乐，晚上还要出席父亲的汉语讲座……。虽说是个孩子，每天却忙得很。

我喜欢唱歌，但唱得似乎很一般，可是也曾作为学年代表，在文艺会和音乐会上独唱过。

父亲非常认真地教我汉语，好象期待我把学到的知识，将来能应用到所从事的日中关系的工作中去。因为他自己有满铁顾问、抚顺县顾问等颇为暖昧的官衔，似乎也希望让我

通过作政治家的秘书、翻译的途径当上政治家或者记者，取得卓著成就。

在幼儿园时代，父亲只要空闲，就让我坐在他的桌子旁边，面对面地教我汉语发音。上了小学，他又安排我出席由他自己任教的满铁研修所汉语夜间讲座，让我坐在教室的最后排，夹杂在大人们中间，把我当作他的一个学生对待。

众所周知，中国大陆，无论是从地理、历史、民族哪个方面看，都是博大而多彩的。就拿汉语来说，一句话也有很多说法。即便是日语，青森口音和鹿儿岛口音也是经常说不通。至于汉语就更不用说了，其方言之多之杂，是日语所不能比拟的。与其说是方言，莫不如看作是一种独立的外语。地方不同，语言就各不相同。这是一个很难沟通语意的国家。其中只有首都北京使用的语言是标准语，是正统的全国通用的语言。父亲教我的正是北京官话。

战前的日本，受明治维新欧化思想影响，重视英德法等西洋外语教育，把汉语纳入正规语言教育的学校，为数极少。

因此象父亲那样勤学之辈，通常的途径是先在日本汉学私塾学习汉诗和汉文，然后在北京的同学会或在上海的东亚同文书院学习应用汉语，同时掌握有关中国的知识。

当时广泛使用的汉语教本是《急就篇》，该篇是宫岛大八编辑的。在战前，它是唯一的汉语系列读本，声望也最高。宫岛大八与川岛浪速（以川岛芳子的养父而出名）、二叶亭四迷等人同是明治初期在外国语学校学习的汉语。他们反对政府轻视汉语，始终以在野的精神，把“善邻学院”作为基地，促进汉语的教学。他们是汉学的大儒。

父亲开始也是用这个《急就篇》学习汉语的，进而又在中国实地经历了精益求精的过程。父亲在担任汉语讲师时，

给抚顺的满铁社员讲授北京官话所使用的教材也是《急就篇》。而且，出席听他讲课的我，从初级到高级同样使用了这个读本。

当时，在满铁工作的日本社员，为了便利与中国人沟通思想，把学习北京官话，定为义务。

全国统一进行国家考试审定资格，从初级到高级，分为四等、三等、二等、一等、特等五个等级。没有审定资格者，满铁不能作为正式社员采用。每上一级，工资也相应增加。所以参加学习的人，都非常努力。

父亲教汉语，总是在白天工作结束后夜间进行。抚顺满铁研修所的礼堂里，每天晚上都挤满了日本职员。我在小学低年级的时候，去听初级讲座，四年级时取得了审定四级的资格，高年级时，听中级讲座，六年级时获得了三等的资格。

留着短发，被父亲称作“小矮子”的我，仅仅是一个孩子，而且是听讲中唯一的女性。父亲一个单词一个单词地发音和朗读文章，首先进行示范，耐心讲解意思和使用方法，接着让全体学员复述，然后让每个学员反复练习。大人复述完了，最后就轮到我了：“听听淑子的发音，那个意思是什么？”对于我的回答，父亲总是满意地点点头。

最近我几乎不用汉语了，现在也不打算讲汉语课。汉语，特别是北京官话的发音，确实非常复杂，而且很难。

例如送气音数字“7”，如果发不出送气音“qi”，就容易错误地让人听成“鸡”（ji）了。父亲对这类发音，都能深入浅出地进行讲解。象练习送气音“7”的时候，父亲便说：“请大家拿出一块纸来，不是让大家擦鼻涕，而是请大家把纸裁成细长的书笺形，把纸条的一端用唾沫贴在鼻尖

上，另一端耷拉着，这就是要领。好，现在进行‘7’的发音，1、2、3，qī、qī、qī。”

大人们鼻子尖上垂着细长的纸条，一齐大声读着“qī、qī”的情景，要是叫别人看见，那是相当滑稽可笑的。然而，父亲教的学生，也包括我，都非常认真。

由于父亲的特殊训练，我这个极其平凡的女孩子，汉语有了很大的长进。

附近医院有位小姐叫柳濂俊子，邻居饭馆里有位姑娘叫小川美都里，从小学一年级的時候，我们就是同班，三个人成了好朋友，不管干什么都在一起，学习小提琴、钢琴也是一块去。三个人无论什么都要一致。在同一个服装店做同样的衣服，同一天穿，背同样的书包，穿同样的鞋，每一个月同一个时间到同一个理发店剪同样的发型。连发带也要一致，什么要是弄错了，谁就是违反“协定”。在三个女孩子的社会里，这些就成了人生的大问题。

也就是说，那是平凡而又和平的儿童时代。但是，也正是在那个时候，战争的乌云笼罩了大人们的世界。1931年9月，我上小学六年级时，抚顺响起了日中十五年战争的炮火，爆发了“九一八”事变。这次事变是由日军爆炸铁路而引发的，起爆地点在离抚顺仅有50公里的沈阳市郊柳条湖（当时说是柳条沟）。

从这时起，命运使我成了“时代之子”。然而在我们孩童的世界里，还依然是自由自在的，对于这次爆炸事件，我没有任何记忆。

但是，第二年，1932年夏天夜晚发生的一件事，却多年来一直印在我的脑海里。现在想起来，也象做了一场梦。

半夜里我被推醒，我揉着发眵的眼睛，刚从床上爬起来，看见母亲的脸色苍白，父亲穿好了衣服正准备出门。这时，外边人声嘈杂，车来车往。大人对我们说：“不好了！出事了，快起来穿好衣服，不管出什么事情，也不要离开妈妈。”我这时已进入了抚顺女子学校，是一年级学生，12岁，弟弟、妹妹共四人，并且都很小。父亲指示：“淑子！你是姐姐，要好好的。”说完就慌慌张张地走了。究竟怎样才算好好的，我并不明白。出了什么事？也没有从母亲那里得到答案。派来的人只说爸爸在满铁事务所里，其他什么也没细说，就走了。

母亲就象老母鸡搂抱着小鸡雏那样，把弟弟、妹妹都捆起来抱着，紧紧地闭着眼睛。过了一会儿，妈妈悄悄地用手指着窗户的方向让我看看。

我战战兢兢地贴近窗边，生怕弄出什么声音来，小心翼翼地打开木板套窗，把眼睛贴在细缝上往外看。此时，黑暗的夜空已被火光映得通红，建筑物的屋顶、路两旁的白杨树在熊熊燃烧的火海前面，呈现出黑色的剪影，火舌象吞噬了遥远的夜空。我想，这是失火了？！但，我没有说。虽然是夏天，我却上牙打着下牙，不停地颤抖着。

在我幼小的心灵里，只知道火的方向是在露天采煤场，我还隐约感觉这不单单是火灾事故。如果仅仅是失火，就不会那么近了，妈妈的脸色也不会变得那样难看，并且街上电灯照得通亮，周围一切都处在骚动惊恐气氛之中……

我们母子六个人紧紧地偎依在一块儿，火势也渐渐地减弱平息了，火光在拂晓的微光中，也暗淡下来，好象没有发生什么事情，天就要亮了。

我们重新躺在床上，弟弟妹妹们立刻进入了梦乡，可是

我翻来覆去怎么也睡不着。我起来又一次走到窗前，打开窗户向外边凝望，东方已经发白了，我把下巴贴在窗台上，回想着那刚刚熄灭的、把夏天夜空烧得通红的可怕大火。

随着夏季朝阳鲜丽光辉的照射，我眼前的土地呈现出鲜明的颜色——抚顺土质本来鲜艳的茶红色。

我家的对面是实业协会（商工会议所），它的院子正好伸到我家窗下。每天傍晚，俊子、美都里和我，沐浴后穿着浴衣，都要在这广场乘凉、休息。

我对实业协会广场是非常熟悉的。每天早晨阳光照在协会正面，白白的墙壁上闪烁着光辉。

今天，一打开窗户，我立刻听到周围的喧闹声。很多的男人大声地喊叫着走过来，一群宪兵和穿着便衣的日本人，押着一个被蒙着眼睛，反绑着双手的中年中国人，宪兵拽着绳子，推推搡搡，那个人东倒西歪地向前走着。

我从装束上知道那个被绑着的人，是苦力头。苦力是中国人的下层劳动者。

我眼见着这伙人把苦力头押到广场，然后把他绑在广场正中的那棵大松树上，解下了蒙在他眼睛上的东西。这时，那个中国人的脸正冲着我的方向，我从窗口战战兢兢地看着这奇怪的情景，那个被绑着的人的眼睛，好象没有看见我，他周围陆陆续续地围拢了很多人，有中国人，也有日本人。

一会儿，手里拿着枪的宪兵，开始大声地问起来，我只听着他们在大声叫嚷着，但说的什么，却听不太清楚。

苦力头紧闭着嘴唇，把土色的脸背过去，一句话也不想回答。宪兵又是一阵大喊大叫，他还是不开口，宪兵的声音越来越发疯了。然而，苦力头死死地盯着宪兵，就是不回答。

又过了一会儿，宪兵倒提着枪，用枪托打中国人的前额，我吓得闭上了眼睛，枪在空中划了一个很大的弧，枪托深深扎在那个中国人的脸上，他的头猛地垂下了，血从额头上流到了前胸。

苦力头被绑在松树上的身体，一动也不动了，好象被打得一下子就断了气。

这时，屏住气观望的人们，拥过来嘈杂地围在松树下。那个男人的身影被嘈杂的人群挡住看不见了，好象是被人抬走了。

围观者形成的围墙，一会儿变长，一会儿变扁，伸缩蠕动着，渐渐地，人们吵嚷着四散离去了。广场似乎只有原来的那棵松树在哭泣。

我吓得目瞪口呆，陷入了一种错觉——这只是一场恶梦吧？我眼前所见到的一切，是我每天早晨看到的那种绚丽和平的景象吗？

我跑出家门，妈妈在背后喊着。我一溜烟儿似地跑到广场。松树下的土地上留着一滩血。妈妈跑过去把我抱起来，我在妈妈怀里大声哭泣着。

前边，我在缅怀抚顺时代时曾描述过迄今没有忘记的道路两旁的白杨树，那主要说的是小学时代抚顺市街上的小景。

进入女子学校以后，煤矿近郊接连不断地出现反日武装。没有足够的准备是禁止出远门的。日军抚顺守备队以缺少人员为理由，把官公厅和满铁的在乡军人社员，组成了民间防备队，各街道也组织了自警团。

1932年，我12岁。是个刚刚记事的女学生，记忆的世界由抚顺白杨树的“绿”色，变成了“红”色，那战火的

“红”色，那天夜里燃烧大火的“红”色，曾经进行过严刑拷问的广场土地的红色，那从中国苦力头额上流出的鲜红的血的红色……

到底那天晚上发生了什么事情，几年后，我直接了当地询问父亲，回答是“土匪”袭击了抚顺煤矿。

当时，满洲的反日武装有“大刀会”，“花枪会”，“马占山军”等，势力都很大。其中，“红枪会”是一种宗教武装团体。他们手持红缨枪，身佩护身符。我听说他们自诩为刀枪不入，勇猛无敌，袭击抚顺，传说是“红枪会”干的。

日本人把这伙人或者称匪贼，或称山贼，或称马贼，或者索性称他们为野盗团。但是，在中国老百姓的眼里，这些人反政府的游击队，是反满抗日游击队的队伍。当地开始出现了被称为“共产匪”的抗日义勇军。

从父亲和朋友们的谈话中，又综合了当时抚顺煤矿工作人员的手记，知道事件是1932年9月15日夜里发生的。我记得是盛夏的夜晚，确切的时间是初秋。

9月15日正是阴历中秋节，煤矿的日本人、中国人都休息，喝酒赏月或者在月下品茶。那是一个节日气氛很浓的宁静的夜晚。

晚上，全矿山一齐放火，发生暴动。十个采煤场当中，有四个事务所被纵火破坏了。来袭击的反日武装据说有一千人。

据久野健太郎（当时，满铁抚顺煤矿职员）的手记《朔风，挑战三十年》（谦光社，1985年）记载，中秋节的前一个晚上9月14日，袭击者们都住在杨柏堡。好象做好了放火的准备，宿舍里的工人们从采煤场背回了很多点火材料和大

块煤，扫除用的破布包，用电线捆着，做成了放火用的火把。

第二天晚上，把火把浸上重油点着，用枪、棒子打碎了选煤场、卷扬机室、机修厂、事务所等屋子里的玻璃，一齐把火把掷进去，计划是极其周密的。露天矿南面一带，野火顺着风势，很快烧成一片火海。

久野等人据说是于被紧急召集跑向位于市中心的电灯部的途中，在大和公园的电车站和电车上，眺望到南方丘陵上那片火海的。

这场大火，就是那天晚上我从木板套窗看到的把抚顺满天生烧得通红的那场大火。

当杨柏堡采煤场的渡边宽一所长匆匆赶到事务所现场，便被一队袭击者杀了，其余在杨柏堡以及东乡坑的六七名日本职员也被杀了。

关东军——抚顺守备队大部分都到周边地区警备去了，留守部队人员缺少，内部空虚，使袭击者的奇袭得以成功。

由于留守部队、警察队、在乡军人以及煤矿防备队、街道自警团等的奋战，终于击退了袭击者。临近第二天拂晓时，扑灭了主要地方的火灾。

9月16日黎明时，我目击了游击队的领导人，那个苦力头被拷问的场面。

上面记述的，就是我从当时与抚顺煤矿有关联者，以及父亲那里听到的所谓“杨柏堡事件”的全部经过。杨柏堡事件，给我留下的是火的恐怖、血的恐怖。在我内心深处，隐约有这样一个意识：似乎那天夜里的事件与抗日游击队的袭击事件是密切相关的。

但是，事实上在发生这个事件的同时，还隐藏着更加悲惨